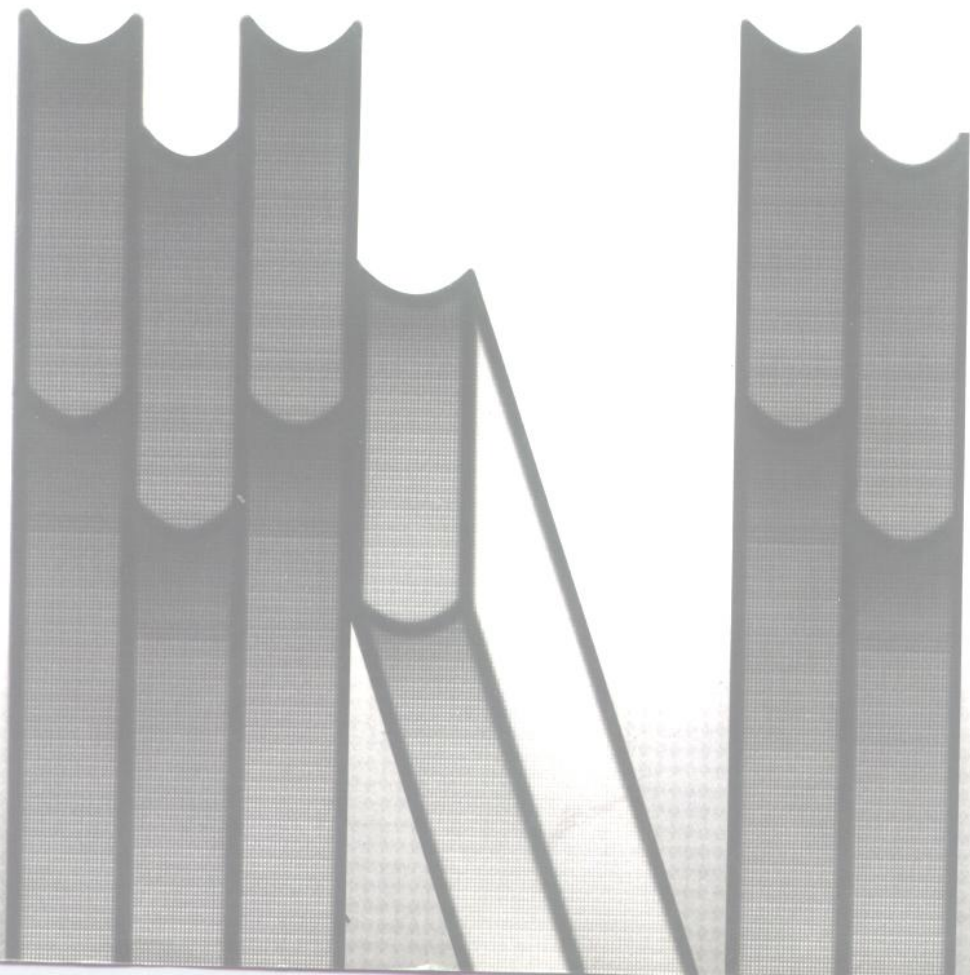


广东教育出版社

HANYU CIYIXUE/苏新春著

汉语词义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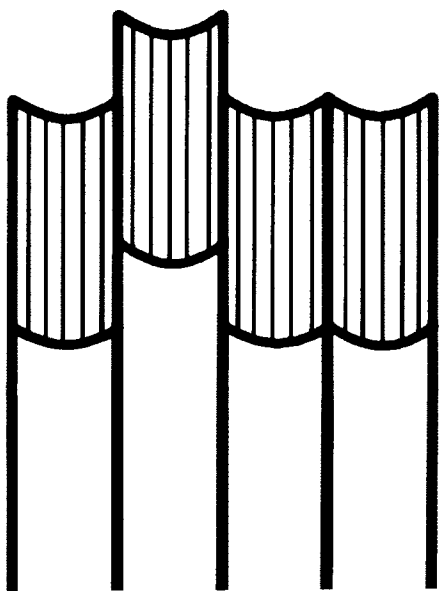


HAN YU CI YI XUE

汉语词义学

苏新春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词义学/苏新春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7

ISBN7-5406-3726-9

I. 汉…

II. 苏…

III. 汉语词义——研究

IV. H13

汉语词义学

苏新春 著

*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粤北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625印张 400,000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2版 1997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001-11,000册

ISBN 7-5406-3726-9

H·46 定价:21.00元

内容提要

本书是关于汉语词义理论的一部研究著作。它系统论述了汉语词义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历史和现实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建构并详细阐述了汉语词义学的学科体系和主要内容。

它根据语言是以语义为主、语形为辅，结构性与文化性相结合的表达系统的观点，对词义这个语言中最基本也最活跃的因素，分别从语言结构意义和语言文化意义两个角度入手，在“结构篇”“人文篇”中剖析了词义的种种成分、特性、演变、系统结构、词义与词形、词义与词的单位等问题。在“方法篇”中系统阐释了词义研究的种种方法和原则。在“史论篇”对两千多年汉语词义研究史进行了概括性的评述。

本书在具体论述中引证了大量的生动语言事实，反映了当代汉语词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有较高的理论参考价值。可供广大语文教学工作者、语言研究者参考，及大专院校文科学生阅读，亦可作为高校的语言学选修课教材。



作者像

作者简介

苏新春，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1953年2月生，南昌人，祖籍湖南新化。1982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1985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汉语史专业。兼任中国语言文化学会副会长、广州市语言文学学会秘书长。

致力于汉语词汇词义的研究，主张语言是语义为主、语形为辅、结构性与文化性相结合的表达系统。对汉语词汇的语言义和文化义，对词的意义内容和它的语音形式、语法形式、文字形式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过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出版著作《文化的结晶——词义》(1994)、《汉字语言功能论》(1994)、《当代中国词汇学》(1995)、《汉字文化引论》(1996，主编)，担任《中国语言学大辞典·人物卷》分科主编，发表论文近百篇。曾获中国语言文化学会学术成果著作一等奖、广东省青年社科成果一等奖、广东省社科成果三等奖、广东省高校社科成果三等奖等。1995年获“广州市10位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称号，1996年评为“广州科技之星”。

序

唐启运

《汉语词义学》是苏新春同志的一部独具匠心别开生面的专著。这本书有很多独到之处，这里择要说说其完整性、系统性、继承性和开拓性的特点。

一、完整性。作者从结构、方法、人文、史论等四大方面对汉语词义各个大大小小的层面作了全面而详尽的论述。其中结构篇，作者深刻地阐明了汉语词义的整体属性和基本形态，阐明了汉语词义的系统性和汉语基本词汇的广义性，阐明了汉语词义的构成特点和演变情况，阐明了汉语词义与其表现形式的辩证关系。凡此等等，规模宏大，不乏弘论，工力至深。

二、系统性。词义的研究，不能零敲碎打，不成理论。这本书的作者一个很重要的基点就是始终坚持把汉语词义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汉语词义各种各样的关系就好像一个大的整体中多个层次的网络，对汉语词义的研究，就是要对这些网络关系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作者据此细致地考察了词义内部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联系，考察了作为语言符号系统的基本活动单位的词的意义，包含着的是物质上的又是文化上的多重关系，考察了词义和词

1992.1.8

形的相互联系，考察了微观结构、中观结构和宏观结构的关系，考察了词的静态形式和动态形式的关系。这些考察都融进了词义是一个系统的理论，论证精当。

三、继承性和开拓性。我国历代对汉语词义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丰硕的成果，也有历史局限性。作者继承传统词义研究的成果，也扬弃了传统词义研究不足的地方，并在这个基础上作了开拓性的探讨。作者吸收了现代语义学理论的养分，结合汉语的实际，对汉语词义作的探讨，在观点上和方法上都提出了不少新见解。例如对词义的整体性系统性的认识，对语言结构的文化内涵的认识，对基本词汇的广义性的认识，对多层次多角度进行研究的认识，对用定量方法进行研究的认识等等，都是很有见地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这样很有特色的书，对古代汉语词汇、现代汉语词汇、汉语史的教学和研究，都是会有借鉴作用的。这类书又寥若晨星，还不多见，更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1992年1月于华南师范大学

序

许威汉

公元前 600 年—前 300 年，语言学的三个中心是中国、印度和希腊。8 世纪阿拉伯语言学受到希腊语言学和印度语言学的影响而兴起。中国语言学在先秦时代独树一帜：《荀子·正名》阐述哲学见解而涉及语言理论；训诂学萌芽于先秦而兴盛于汉代，出现《尔雅》、《方言》等多部语言学名著；东汉许慎把所接触到的篆书、籀文、古文作总体分析，创立以偏旁为部首的编排文字的方法，立五百四十部，据形系联，析每字之结构，并加诠释，寻案本义，博采古训，旁及方言；汉代以后的音韵学受外来影响，佛教的“声明”启示“等韵学”的产生。从这些情况看来，语言学是一门古老的社会科学，它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到了 19 世纪，有三种因素对语言的发展起作用：一是科学上的重要发现、发明以及各种学说、社会思潮对语言学产生影响；二是社会的需求推动语言学演进；三是语言学自身要求解决一系列内在问题，而三者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20 世纪电子计算机问世以来，它的应用范围大大超过单纯的数值运算，它与语言学结合，使语言学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语言学研究有新的突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各门学科之间相互联

系、相互渗透，大大扩展了现代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又出现了许多语言学的边缘学科。从这些情况看来，语言学又是一门年青的社会科学，并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现代语言学诚然不同于古代语言学。人类最早的语言研究是从考释古代文献开始的，所以早期人们把语言学当作人文学。我国传统的语言学为经学附庸，人们称之为“语文学”。现代语言学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结构、语言的功能、语言的运用、语言的历史发展。近年随着文化与文化史研究热潮的掀起，出现了语言与文化相关性的理论，主张科学的语言学科应向民族文化和民族语文传统认同并加以转化，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这当然不是先期人文涵义上的历史重复，而是中国语言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苏新春同志的《汉语词义学》就是应时代召唤而问世的。我国古代词义的研究固然早已开始，但是长期以来缺乏独立分科的系统研究，苏新春同志在前人认知的基础上，借鉴外来见解，深入探索，益以新知，建构词义理论框架，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汉语词义学》全书的组成包括结构篇、人文篇、方法篇、史论篇四大部分。其中结构篇是主体，核心内容是对词义本身的构成成分和属性的研究；人文篇对词义的人文表现进行了新探讨，为语言的人文性的认同提供重要的依据；方法篇综合提示历来词义研究的方法，丰富了学科方法论的内容；史论篇概述了古今词义研究的状况和路子，史论结合，以论带史。任何学科，原则上都应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语言学学科自然没有例外，《汉语词义学》也正体现出了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有机结合与联系，以为建立词义学的坚实支柱。这里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就方法论而言，它是关于方法的学说，有哲学涵义上的方法论、逻

辑学涵义上的方法论和各部门具体科学自身的方法论。在人类认识史上的很长时期里，方法论主要是指思维过程中的方法论，适用于各门学科。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学、符号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都充当思维过程中的理论工具而进入方法论行列。至于学科自身的方法论，是处理学科资料揭示规律而采取的特殊方法论，而又为哲学、逻辑学涵义上的方法论所驾驭。不同学科有不同的方法论。王力先生总结治语言学经验八条，第一条便是要有科学方法论，说方法论不对，必将徒劳无功。苏新春同志撰《汉语词义学》，“方法”特列为专篇讨论，实是十分可取的。而在阐释汉语词义的全过程中，又注意到思维过程中的方法论和思维过程中理论工具方法论的运用，更是难能可贵。本书从形式到内容都取得成功，与具有正确方法论分不开。

全书内容，在继承与创新方面显现许多特色，兹仅举二端略供读者参。首先，词义分析除采取基本范畴分析法，在强调概念意义的同时，寓诸引申义的阐释，指示概念意义同联想意义及社会意义的区别。概念意义以逻辑为基础，属封闭系统；联想意义以经验为依据，属开放系统；社会意义强调动态的社会的词义分析，又与联想意义相交织。循此多角度多渠道而探求，词义系统网络将历历在目。

其次，词义分析能实事求是，重视借鉴现代语言学新成就而不随意牵合。比如总论说：“汉语词义学本身就未曾有过定格。”这是作者对汉语词义研究进行充分归纳分析之后所得出的结论，而又不牵合于一般对“语义学”的说解。有人在词义学与语义学之间划等号，说“词义学也叫语义学”（新版《辞海》），未免简单化了。我们知道，语义是哲学、逻辑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信息学等学科研究的对象，在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等领域交叉

反映。欧美学者原先整理研析了词义演变的几种类型，提出词义扩大、缩小、转移说，这只是个别语义事实的观察分类，不是系统的语义研究。结构主义理论给语义学以影响，语义学便由历史性研究转向共时性研究，由研究一个词的语义变化转向研究词与词的语义关系。但结构主义语义学只以词与语素为研究单位，没有注意词组合成词组、句子的意义。后来乔姆斯基把语义同句法、音系并列为语言的三大系统，词汇学被视为语义学的一支，即所谓词汇语义学。而时过不久，有的学者认为语义结构应以句法结构为基础，有的学者则认为句法结构应以语义结构为基础，争论不休。在这过程中，语言学家又觉得在很多方面语义与句法界限难划分，与语用界限也难划分。语义学是什么，语义学家之间有分歧，哲学家、逻辑学家之间也有分歧，甚至连它能否成为独立的学科也无定论。进入80年代，还兴起境况语义学，认定语义学应研究句子反映的境况，而不是研究句子的真值。凡此种种，认识的不一致，有目共睹。简单地把词义、词义学同语义、语义学等同起来看待，势将引致词义和词义学研究受到干扰而陷入困境。然而本书有鉴于此，并深感“汉语词义学本身未曾有过定格”，进而力求从汉语实际出发，认真探讨，促使词义学纳入科学轨迹，着实值得称道。

仅如上二端，已可观本书卓然有所建树之大略，余无庸一一备述。任何一种学说，都有补正发展余地，语言学说自无例外。本书有待来日补正，精益求精，自在情理之中。本书诸多真知灼见，则为词义学华构之所需，且将经过逻辑检验和实践检验而获得真理性的有力证明。本书的出版，良可志贺，特为之序。

1992年春节于上海师范大学

序

申小龙

两年前，当苏新春同志把他的《汉语词义学》初稿送给我的时候，我就深受鼓舞。这不仅因为这部著作科学地总结了当代汉语词义研究的丰硕的成果，也不仅因为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对汉语词义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更由于这部专著的出现显示着我国语言学历史进程的一个新的时代——语义的时代。

纵观中国语言学两千多年的变迁，我们可以发现一条很有意思的曲线，即传统小学以语义的训释、析解为中心；而本世纪初开始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则以语形的分析为科研最高追求；进入 80 年代以后，汉语的语形分析危机四伏，无论是句法分析还是词法分析，都开始引入语义知识，人们终于开始认识到语言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文现象，是一个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脱离了语义则无所谓语形。而就在这时候，语义的苏醒迅速有了摆脱语形、建立独立的汉语词汇学与词义学的“自我”意识，一批中青年学者开始同时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切入语义的独立研究。这股思潮和语法研究中的语义取向形成一股合力，在中国文化语言学大思路的震宕下迅速地走向中国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前沿。我们可以说，中

国语言学正在进入“语义的时代”。

中国现代语言学中曾经没有词汇语义研究的位置，这是一种十分深刻的文化错位现象。不要说80年代之前缺乏系统的汉语词汇语义理论，就是具体的研究也是寥若星辰。据统计，1900年至1949年古汉语语法的论文共发表47篇，1950年至1980年猛增到284篇，增长率是504%。同期古文字的论文则由271篇上升到521篇，增长率是92%。而古汉语词汇的论文则由前50年的848篇下降到后30年的472篇，下降了44%。在专著方面，后30年古汉语词汇的著作也只有2部，远逊于文字（42部）和音韵（8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中国语言学在向现代科学意义上科学体系的转化中，片面将形式化这一欧洲近代科学的理想作为汉语分析的宗旨，始终未能形成汉语语义的系统研究的气候，因而语义研究长期萎缩在训诂学、文字学这些古老的学科内。

随着当代人类科学，文化语言研究中对人文因素的重新发现与肯定，汉语的语义研究迅速发展起来。它首先表现为汉语词汇学的繁荣，诸如词汇学与训诂学划界之争、单音词与复音词研究、同义词研究、同源词研究等都先后形成了热点。进入80年代以后，汉语语义研究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这就是词义研究的异军突起。据1980年起国内发表的古汉语词汇研究论文900篇的统计，尽管大部分仍是诠释具体字词的文章，但探讨古汉语词义理论的论文已有近200篇之多。“词义热”的兴起显示出汉语语义研究的日趋成熟。它表明当代汉语学者在使语义研究传统现代化的努力中找到了突破口。词义研究一开始虽然是纯语言学的研究，但是由于语言对于民族文化的本体论意义和语义作为文化阐释的基本依据，词义研究与文化研究能够迅速产生互动的效应，形成良好健全的学术生态环境，这正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语言学梦寐

以求的境界。

在苏新春这部著作中，我们对当代汉语词义理论的各个层面获得了系统而又深入的了解。从本体论来说，在词义的基本属性方面，作者讨论了汉语词义的社会性、历史性、民族性、概括性、具体性、静止性、运动性、系统性等；在词义成分方面，作者讨论了汉语词的深层义、表层义；在词义系统方面，作者讨论了汉语词义的微观结构、中观结构、宏观结构。从方法论来说，作者作为一位多年从事词义研究的专家，对汉语词义研究各种方法及其沿革作了详尽而又深刻的阐述。在具体的论述中，作者对汉语词义的运动规律作了相当细致的刻画，例如有义位之间的词义运动，义位义向词位义的运动，词位义之间的运动等。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对汉语词义理论的探讨充分汲取了传统训诂学的营养。例如在探讨词义的概括性和具体性时，作者认为：了解了词义的概括性和具体性，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认识“小学之训诂贵圆，经学之训诂贵专”、辞书释义较泛、注释文释义较窄的特点，并进而认识词义分化派生的内在制约因素。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传统训诂学对古籍的整理和文意的疏通为古汉语词义的研究廓清了解障碍。传统训诂学对古汉语词义的认识成果和处理方法，显示出传统词义理论的相当高度，将成为汉语词义学的有机理论成分。汉语词义学的研究往往以训诂学提出的词义问题为突破口，以容纳了丰富词义现象的训诂典籍为重要参考材料，以挖掘整理重要训诂学家的词义见解为线索。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提出的汉语词义学可以视为传统训诂学语义理论的一种现代条理和创造性转化。这就使作者自始至终运用着一种具有深广的文化内涵和明晰的思维轨迹的语言。这种语言体现着我国新一代语言学工作者的“世界观”，也预示着我国语言学走向新世纪的新的学术范型。

从本质的意义上说，词义的研究是一种文化的研究。它研究的是规定一种文化的精神状态乃至生存状态的意义系统。苏新春在他的词义研究中正贯注着这种可贵的文化意识。在本书中他于“结构篇”之后专列“人文篇”，对汉语词汇的文化内涵作了多方面的考究，从文化因素的消长进退看词语的产生和消失，从文化心理、习俗看词的命名和词义的演变，从文化的观念体系看词汇的系统，尤其对汉语词汇结构的具象性和辩证性作了深入的、富有创见的阐发。在本书的“史论篇”中，他首次提出了古汉语词汇研究的人文价值、现代词义研究的人文主义学派问题，并对当代汉语词义的人文研究作了全面的描述和展望，这在汉语词汇、词义学史的研究上独具慧眼，开风气之先。汉语研究中的人文主义思潮始于本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在《中国句型文化》、《汉语人文精神论》、《中国语言的结构与人文精神》、《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中国文化语言学》等一系列著作中对汉语的人文性和与之相适应的汉语研究的人文主义方法作了阐述，但这些阐述主要集中在语法方面。苏新春这部著作从词汇、词义的方面又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汉语人文研究的新天地，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期待着有更多的学者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从事这种文化语言学范式的工作。最近我先后应日本中国语学会、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关西大学、东京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等的邀请讲学，日本汉语学界对中国当代语言研究中的人文主义新范式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寄希望于汉语研究中走出一条具有民族文化和民族语文传统特色的现代化的新路来。在这一方面中国年轻的一代语言学工作者责无旁贷，任重而道远。苏新春的研究在这一方面走在了前列。在本书出版的时候，我近年撰写的《语言的文化阐释》、《中国语文传统的现代意义》、《文化语言学》等著作及我主编的《文化的语

言视界——中国文化语言学论集》、“文化语言学”丛书、《当代中国语言学论纲》等著作都将出版。文化语言学将以其崭新的步伐进入中国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这是我读苏新春这本著作一个强烈的感受。

当代汉语语义研究的中兴，使中国现代语言学在历经世纪初“文化——语义”断裂的危机之后，重新获得了一种健全的，植根于汉民族文化传统并加以创造性转化的运动形态。它正在将西方语言学的语义分析方法同中国语文研究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迸发出新的生命力。有一种观点认为，词义描写的精密化、科学化和词义与文化的贯通是互为矛盾的，因为文化的研究不需要如此深入的语言研究。这是一种误解。当代词义研究已经证实，语义的描写和语义文化内涵的揭示是互为促进，互为前提，缺一不可的。离开了语义的文化内涵，不可能有科学、严密的语义描写，甚至连词义都无法系联。反过来，只有深入、系统地描写语义，才能对一种文化作出科学的阐释，词义与文化的贯通，不仅意味着研究过程中充分关注词义与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决定，而且意味着汉语的语义分析必须而且只能从丰富的语义材料中提炼出具有汉民族特点，符合汉语意义体系实际的范畴、理论、规律和方法。这是因为人类文化是多元的。各民族的语义系统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例如汉语通释语义的雅书是由采集诸书训诂名物作客观排比而成的。这种编纂体例决定了雅书同条训词与被训词，以及被训词之间关系的临时性。我们不可能以语义学严格意义上的义场或义位的定义来看待雅书的语条。又如义群的归纳、系联也都有不同民族语言特有的范式和规律。因此，科学的汉语语义研究，不是走捷径、图省力去生搬硬套西方的语义分析理论，而是要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把立足点放在汉语语义的特点上。而正